

# 鹊尾炉源流考

## ——从犍陀罗到黄河、长江\*

林梅村(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教授)  
郝春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博士研究生)

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7.10.004

鹊尾炉是中国古代佛教的行香法器之一,始见于南北朝,王琰《冥祥记》载有“费崇先少信佛法,常以鹊尾香炉置膝前”<sup>[1]</sup>。这种香炉采用杯形香斗,手柄前端铆入香斗,尾端下折,通称“长柄香炉”,或简称“柄香炉”。据考古发现,佛教行香法器始见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中亚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中国鹊尾炉则从犍陀罗佛寺流行的长柄香炉演变而来。不同的是,犍陀罗长柄香炉采用环首或动物形手柄。

在中国古籍中,长柄香炉有许多不同称谓。其中一种手柄末端形似喜鹊尾,故南北朝至唐宋古籍称作“鹊尾炉”,而敦煌文献则称“铜香炉”、“长柄铜香炉”或“长柄熟铜香炉”等<sup>[2]</sup>。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件长柄银香炉,炉柄刻铭文“咸通十三年(872年)文思院造银白成手炉一枚并香宝子共重十二

两五钱”,该地宫出土《物帐碑》亦称“手炉”<sup>[3]</sup>。需要注意的是,唐代以来长江、黄河流域还流行一种狮子镇柄手炉,那么,敦煌文献所谓“长柄香炉”实际上包括两种类型的手炉。本文只讨论南北朝以来的鹊尾炉,唐代以来的狮子镇手炉将另拟专文。为便于讨论,我们以河北定州静志寺地宫发掘品为例,将唐代鹊尾炉各部位名称绘图如下(图一)。

关于鹊尾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学界。中国代表性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种。第一,孙机对“莲花鹊尾炉”形态及相关问题详加考证,认为宣化辽墓中出土鹊尾长柄香炉的形制在“公元2、3世纪时印度犍陀罗雕刻中已经见到”<sup>[4]</sup>。第二,李力提出焚香供佛是佛教传入与中国传统熏香习俗结合的产物,并根据中国石窟寺壁画和浮雕中时代较早的几件手炉形象,结合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河南洛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文物古迹调查”(项目批准号:15JJD780001)的资助。

阳神会墓等处发掘品,对敦煌莫高窟壁画所见手炉进行了详细考证<sup>[5]</sup>。第三,冉万里对中国手炉的类型进行了系统分类与分期,并提出这些手炉在中国以西不见,有可能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于中国本土发明创造的<sup>[6]</sup>。此外,其他中国学者如王明珠、李雪芹等人的论文也有各自的重要贡献<sup>[7]</sup>,我们将在下文的讨论中陆续介绍。

海外鹤尾炉研究的代表首推日本学者加岛胜,他结合中国的考古发现,详细整理了日本东大寺、法隆寺、正仓院等地所藏手炉,为探讨中国鹤尾炉如何经朝鲜半岛向日本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sup>[8]</sup>。另一项重要成果是韩国东国大学李溶振的博士论文《韩国佛教香炉考》。尽管此文主要讨论韩国古代香炉,但作者全面调查了犍陀罗、印度、中国和日本出土的各类手炉,有力推进了鹤尾炉研究的深入<sup>[9]</sup>。关于鹤尾炉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韩国留学生崔菊姬发表的一篇论文,她对犍陀罗、印度出土手炉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出土鹤尾炉与狮子镇手炉进行了综合研究,但资料收集不如李溶振的论文齐全<sup>[10]</sup>。

尽管中外研究者对鹤尾炉做过诸多考证,但目前学界对这种香炉的源流和演变仍缺乏系统研究。我们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考古发现、实物考察和金属成分检测,全面调查和研究中国出土鹤尾炉的源流。如有不当,还望海内外研究者批评、指正。

### 一 犍陀罗手炉的起源

焚香之俗起源于近东,始见于古埃及第五王朝(前2500~前2400年)法老浮雕<sup>[11]</sup>。公元前6世纪土耳其西部的吕底亚王国也用香炉焚香,有落地式(图二:1)和狮子柄两种。后者为青铜铸造,有梯级锥形炉盖,炉身连接手柄,并用狮形支架连接香斗与炉盖,通长62.5、高10.9厘米(图二:2)<sup>[12]</sup>。这件手炉属于吕底亚宝藏,出自吕底亚王国末代君主克罗斯(前560~前546年)陵墓。1966年,这座古墓惨遭盗掘,大批随葬器物于1966~1976年分三批走私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一度被误认为是希腊宝

藏或古波斯艺术品。1993年,吕底亚宝藏归还土耳其,如今分藏于乌沙克博物馆和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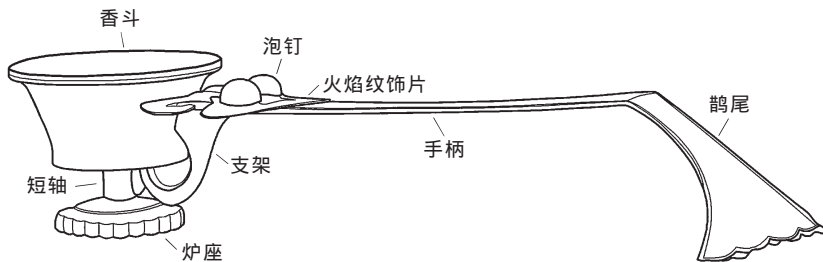
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王国被古波斯帝国兼并,吕底亚王焚香习俗相继为古波斯、帕提亚王公贵族传承,并随着古波斯、帕提亚帝国的扩张而传入欧亚草原和中亚犍陀罗佛寺。伊朗波斯波利斯王宫刻有古波斯帝王用落地式香炉焚香的浮雕,而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古墓出土波斯地毯则织有古波斯贵族焚香图案<sup>[13]</sup>。不过,中亚遗址迄今未见古波斯帝国或更早时期的香炉遗物。

中亚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长柄香炉,是1913~1934年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在巴基斯坦塔克西拉(Taxila)佛教遗址发现的。东晋高僧法显曾经亲临实地,造访过印度河上游的犍陀罗佛寺。他在游记中写道:“自此(指犍陀卫国)东行七日,有国名竺刹尸罗。竺刹尸罗,汉言截头也。佛为菩萨时,于此处以头施人,故因以为名。复东行二日,至投身喂恶虎处。此二处亦起大塔,皆众宝校饰。诸国王、臣民,竞相供养,散华然灯,相继不绝。通上二塔,彼方人亦名为四大塔也。”<sup>[14]</sup>法显所谓“竺刹尸罗”正是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汉译佛经或称“坦叉始罗”。

关于中国手炉的起源,冉万里曾提出“犍陀罗地区的手炉应该是中国手炉的祖型”,可是他没有对犍陀罗手炉的来龙去脉做进一步调查<sup>[15]</sup>。崔菊姬注意到犍陀罗手炉的考古发掘品,她在论文中提到塔克西拉出土的两件手炉,并引述了马歇尔对其中一件手炉(编号321)的描述<sup>[16]</sup>。殊不知,马歇尔在考古报告《塔克西拉》中共著录了三件长柄手炉,分别编为第320~322号(图三:1~3),皆出自塔克西拉遗址锡尔卡普(Sirkap)佛寺。

马歇尔在《塔克西拉》第2卷介绍说:“这类香炉是一种三足小浅碗,一侧有个横向长柄。在最早的例子(320号)中,柄无花纹,柄末端是圆环。后来的两例中,柄的样式是跃立的狮子,一个有翅膀,一个没有翅膀,都是铸成的。320.三足铜香炉,口沿上铆着一个长柄,柄末端是

图一 鹤尾炉各部位名称



圆环。长 10.62 英寸,直径 4 英寸。Sk(锡尔卡普)……方形区,第五层,希腊时期的。”另外两件分别为:“321.类似前一件,但柄的样式是个有角、有翅的狮子。香炉有三足,装饰着两圈浮雕珠子。狮子前腿铆在香炉上,后腿立在一个长方形底座上。长 9.25 英寸。Sk(锡尔卡普)……方形区,第二层……322.青铜柄,形状是跃立的狮子,长 6.62 英寸,是安息时期的一件有生气的作品。狮子前腿上有孔,可铆到香炉上(香炉本身已经缺失)……Sk(锡尔卡普)……方形区,第一层。”<sup>[1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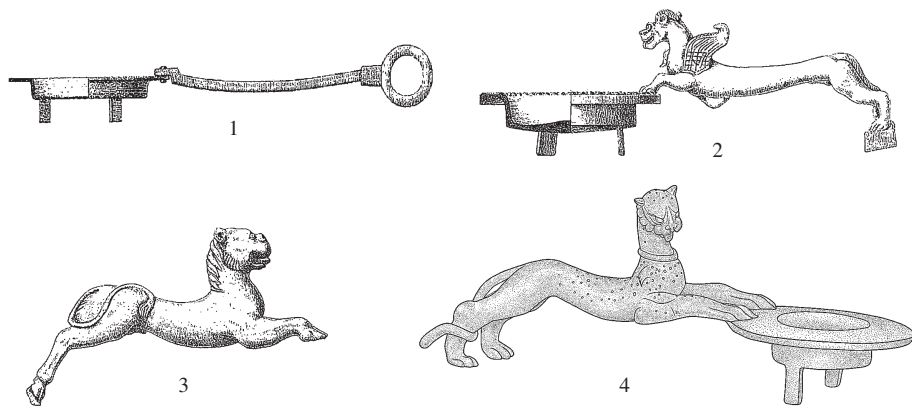
马歇尔所谓“希腊时期”,指印度—希腊王国统治犍陀罗时期,那么,锡尔卡普 320 号环首柄手炉当为公元前 2~前 1 世纪之物(图三:1)。马歇尔所谓“安息时期”,指印度—帕提亚王国统治犍陀罗时期,那么,锡尔卡普 322 号狮子柄手炉当不晚于 2 世纪中叶(图三:3)。马歇尔没说 321 号“有翅的狮子”柄香炉的具体年代,但

这件文物出自锡尔卡普“方形区第二层”,要比 322 号狮子柄手炉所在地层早一个时期,当为 1 世纪印度—帕提亚王国早期之物(图三:2)<sup>[18]</sup>。2013 年 6 月,我们在巴基斯坦考察犍陀罗遗址和馆藏文物时,在塔克西拉博物馆见到锡尔卡普出土环首柄手炉,红铜铸造,炉身呈折沿三足盘式,口沿宽平,炉柄与炉盘相接,柄末端由铆钉嵌入环首。这是目前所知犍陀罗佛寺最早的行香手炉(图四:2)。

据德国学者菲利普·冯·扎恩调查,锡尔卡普出土“有翅的狮子”铜手炉,现藏于卡拉奇市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sup>[19]</sup>。这件手炉亦为红铜铸造,炉身呈折沿三足盘式,与塔克西拉博物馆所藏环首柄手炉相仿,不同的是折沿上饰两圈连珠纹。手柄的“有翅的狮子”当称“格里芬”(griffen),双翼展开,四肢舒展呈跃起状,以前肢抬起踏于炉盘口沿的方式将炉柄与炉身巧妙相接。据冉万里调查,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



图二 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藏落地式银香炉和乌沙克博物馆藏狮子柄铜香炉



图三 锡尔卡普佛寺出土长柄手炉和帕提亚豹柄手炉

路美术馆藏有一件格里芬柄铜手炉,与锡尔卡普发掘品相似,长约19.4厘米,据说出土于伊朗,年代在公元前2~2世纪<sup>[20]</sup>。这段时间正值帕提亚帝国统治伊朗高原时期,那么,犍陀罗格里芬柄铜手炉当源于帕提亚艺术。

法国考古学家吉尔什曼的名作《波斯艺术》著录了一件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帕提亚豹柄手炉,年代定在1世纪<sup>[21]</sup>。据该博物馆网站介绍,这件手炉是1961年美国瓦特基金会在伊朗布鲁德吉尔德(Burudjird)购买的,青铜铸造,高11.6厘米,炉身呈折沿双足盘式,豹形手柄

(图三:4)<sup>[22]</sup>。这件帕提亚文物相当重要,再次说明犍陀罗狮子柄手炉源于帕提亚艺术。

此外,巴基斯坦西部还发现一个鹿顶香炉(图四:1)。据美国艺术史家埃玛·邦克调查,此香炉为青铜铸造,高10.8、直径7.1厘米,与犍陀罗出土带佉卢文题记的野山羊顶银酒杯(图四:3)器形相似。据华盛顿大学邵瑞琪教授考证,这件野山羊顶银酒杯属于印度—斯基泰时期。因此,埃玛·邦克将这件鹿顶铜香炉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世纪<sup>[23]</sup>。如果这一考证可信,那么这件鹿顶铜香炉和锡尔卡普出土环首柄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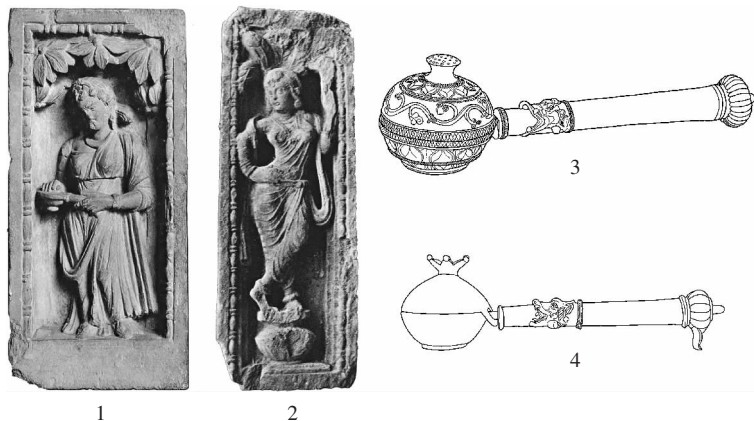
图四 犍陀罗出土鹿顶铜香炉、环首柄铜手炉和野山羊顶银酒杯

手炉(图四:2)则属于同一时代,两者大小也匹配,因此前者有可能是后者或同类手炉的香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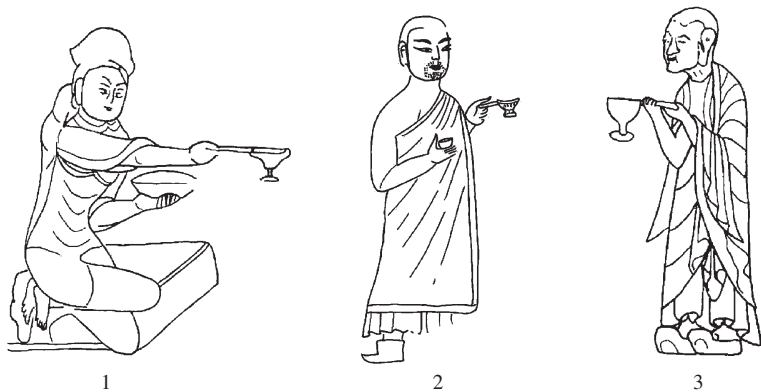
## 二 犍陀罗手炉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1922年,德国学者勒科克在《古代中亚晚期佛教》一书中刊布了一组犍陀罗人物浮雕。其中一幅为持长柄香炉的比丘尼造像(编号34923),高约37厘米,香炉为折沿盘式,盘下有底座(图五:1)。不过,勒科克没有提供这件佛教造像的具体出土地点,只是笼统地说发现地点为犍陀罗<sup>[24]</sup>。1937年阿富汗绍托拉克(Shotorak)贵霜佛寺的发现,才使这幅犍陀罗人物浮雕的确切出土地点浮出水面。

1937年,梅尤尼德领导法国考古队对阿富汗绍托拉克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该遗址位于喀布尔以北约64公里,是一处2~3世纪贵霜佛寺遗址,法国考古队从中发掘出大批犍陀罗佛教题材的浮雕。1942年,梅尤尼德出版考古报告《绍托拉克》一书。我们注意到,该报告第1卷图版33第107号照片中犍陀罗比丘尼造像(图五:2)<sup>[25]</sup>与勒科克刊布的犍陀罗人物浮雕的构图及表现手法如出一辙。显然,这一犍陀罗比丘尼造像出自绍托拉克遗址,为我们研究贵霜王朝流行的犍陀罗手炉提供了重要实例。



图五 阿富汗绍托拉克遗址出土犍陀罗佛教造像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6世纪犍陀罗手炉



图六 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炳灵寺石窟、山西高平石堂会石窟所见北朝手炉



图七 阿旃陀石窟第26窟印度比丘持手炉进香造像

吠哒王朝统治中亚时期,犍陀罗佛寺仍流行长柄香炉,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两件



图八 龙门博物馆藏北魏清河王元怱鹊尾炉



图九 北齐库狄迴洛墓出土鎏金铜香宝子与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馆藏北魏洛阳时代“金香炉”

龙首柄手炉,皆购自巴基斯坦,也即古代犍陀罗地区,年代为6世纪。这两件手炉器形相似,皆有炉盖,盖与炉身相连,可向上翻起。第一件为青铜铸造,长达43.5厘米,需双手持炉,盖纽为莲蓬形,盖与香斗饰莲花,炉柄为圆柱形直柄,前端三分之一处周饰一龙首,末端饰花瓣纹(图五:3)。第二件亦为青铜铸造,长约22.9厘米,单手可持,盖纽形似菱角,周身素面无纹(图五:4)<sup>[26]</sup>。

随着中亚佛教向东方的传播,行香礼佛之俗在丝绸之路上流行起来。南北朝时期,新疆

和甘肃石窟壁画所见行香手炉皆为杯形香斗,敞口,无折沿,有底座,手柄与香斗口沿相接,柄端不见鹊尾。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第205窟主室券顶菱格因缘壁画所绘手炉,香斗无折沿,下有炉座(图六:1)<sup>[27]</sup>。此窟榜题记录了龟兹王室成员姓名,德国哥廷根大学瓦尔德施密特教授以此为据,将其年代定在6世纪末<sup>[28]</sup>。又如甘肃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西秦壁画绘有比丘执手炉礼佛图像,香斗无折沿,下有炉座。西秦乃十六国之一,鼎盛时疆土包括今甘肃西南部和青海部分地区,共历四主,凡37年,永弘四年(431年)为夏国所灭。从时间看,甘肃炳灵寺西秦壁画所绘长柄香炉当为中国境内目前所见最早的手炉图像(图六:2)<sup>[29]</sup>。

2006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

裕群等学者实地考察山西高平石堂会石窟并做了测绘和记录。据他们的调查,石堂会石窟第1窟东西两侧壁有浅浮雕佛弟子像,其中西壁北侧为弟子迦叶持手炉浮雕像(图六:3),高约71厘米,光头侧脸,面朝佛龕,身着袒右式袈裟,双手前伸,手持一柄香炉,香斗无折沿,下有炉座。他们在调查报告中指出,高平石堂会第1窟壁面浅浮雕弟子像的表现手法,与龙门莲花洞和洛阳吉利区万佛山石窟第3窟相似,这种形象不见于云冈石窟,应源于北魏迁洛之后所建洛阳石窟寺。太原天龙山第3窟龕外两侧手

持香炉的迦叶、双手张开的阿难弟子像和成对的二束髻供养人,均为浅浮雕,其题材布局和形象姿态都明显承袭了石堂会第1窟的表现手法<sup>[30]</sup>。

### 三 印度手炉的兴起与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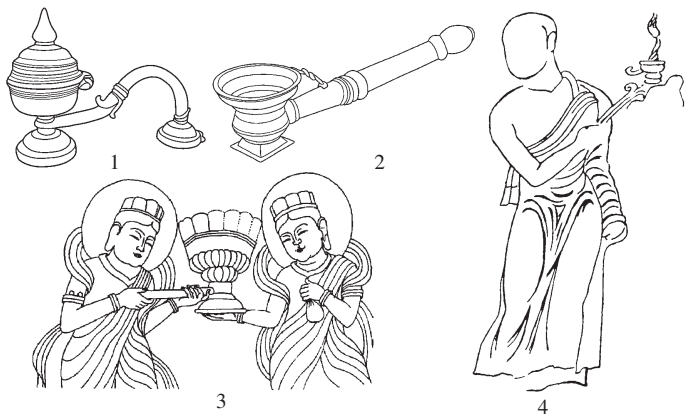
在印度本土,长柄香炉罕有发现,最早的实例见于阿旃陀石窟。其中第26窟左侧廊释迦涅槃造像下刻有一尊手持长柄香炉的比丘浮雕,香斗无折沿,手柄接在香斗底部,与犍陀罗手炉柄端接在香斗口沿不同。崔菊姬说阿旃陀石窟第26窟比丘造像膝前还雕刻了另一个长柄香炉<sup>[31]</sup>。然而,从本文所引照片看,这尊比丘浮雕像膝前实际是一个椭圆形托盘,盘内有两束莲花和一个香宝子(图七)<sup>[32]</sup>。

阿旃陀石窟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一直沿用到7世纪中叶,现存30窟(其中一座未完成)。阿旃陀窟型有支提窟、塔堂窟和僧房窟等多种形式。雕刻手炉的第26石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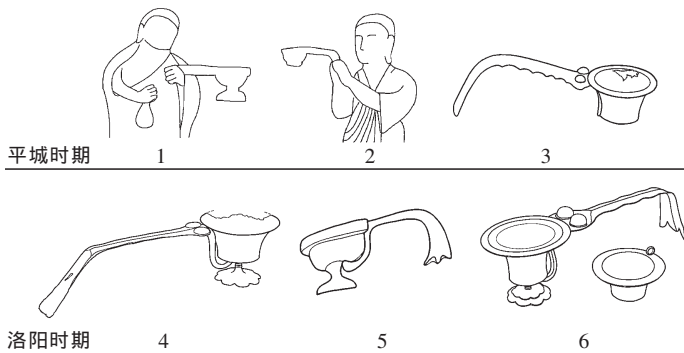
是一座支提窟,开凿于6世纪前期,也即笈多王朝末期。阿旃陀石窟比丘造像所见手炉,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9世纪印度手炉相同。这件手炉为青铜铸造,通长19.7、高13厘米,手柄接在香斗底部(图一〇:1)<sup>[33]</sup>。中国罕见此类手炉,仅在新疆库木吐喇石窟、甘肃炳灵寺石窟和云冈石窟各见一例。第一例是德国考古学家勒科克在新疆库木吐喇石窟GK17窟壁画上发现的,长柄接在香斗底部(图一〇:4),年代约在南北朝时期<sup>[34]</sup>。第二例见于甘肃炳灵寺无量寿佛龕(第6龕)侧壁所绘印度式手炉,年代在北魏时期<sup>[35]</sup>。第三例见于云冈第13窟南壁明窗西侧,有二佛并坐龕下正中,供养天人双手执长柄香炉,研究者称作“组合式”。这件手炉由三部分构成,中部呈圆柱体,且与直柄前端相接,柄尾握于手中;

下部为高圈足;与中部圆柱上层相接的是喇叭口棱形体,外饰莲瓣纹样(图一〇:3)<sup>[36]</sup>。这座洞窟属于云冈石窟第二期,年代约在471~494年<sup>[3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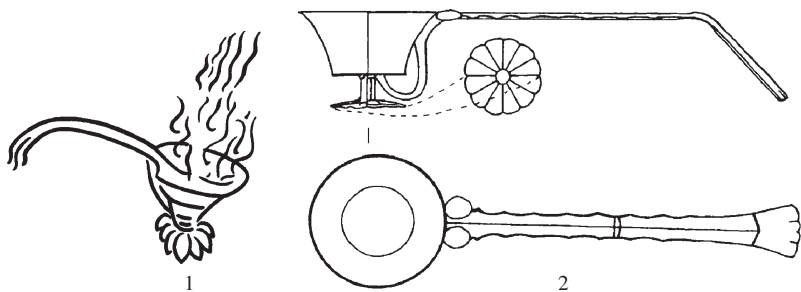
关于北魏平城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魏书·释老志》记载:“太安初(约455年),有师子国(即狮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sup>[38]</sup>值得注意的是,斯里兰卡流行印度手炉,贾夫纳博物馆(Jaffna Museum)收藏了一件印度手炉,黄铜铸造,手柄接在香斗底部(图一〇:2)。由此可知,云冈石窟第13窟所见印度手炉当为5世纪中叶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沙门经丝绸之路沙漠路线传入平城,并雕凿于云冈石窟第13窟。



图一〇 印度、斯里兰卡、云冈第13窟与库木吐喇石窟所见印度手炉



图一一 北魏鹤尾炉发展的两个阶段



图一二 江苏丹阳南朝画像砖墓手炉图像与湖北当阳长坂坡南朝墓出土鹤尾炉

#### 四 鹤尾炉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兴起

南北朝时期,焚香礼佛之俗在黄河、长江流域蔚然成风。北魏天兴元年(398年)七月,拓跋珪定都平城后,鲜卑统治阶层在中原和西域文化影响下,开启了中外文化交相辉映的平城时代。北魏文成帝大兴土木,开凿云冈石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北魏高僧或供养人行香礼佛的石窟造像,而中国最早的鹤尾炉始见于北魏平城时代云冈石窟造像。

云冈石窟造像所见手炉,长柄末端下折形似鹤尾,可谓“鹤尾炉”。这种手炉在新疆、河西走廊等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寺前所未见,实乃北魏平城时代出现的新器形。平城时代鹤尾炉手柄与香斗口沿齐平,当源于犍陀罗手炉而非印度手炉。平城鹤尾炉还可以根据香斗的不同分为两类:第一类鹤尾炉香斗有炉座,如云冈石窟第13窟南壁侧门拱东侧僧人所执鹤尾炉(图一一:1)<sup>[39]</sup>,这类鹤尾炉源于绍托拉克佛寺遗址出土贵霜时期犍陀罗手炉,与克孜尔石窟壁画、炳灵寺石窟壁画所绘手炉相似,只是增添了鹤尾;第二类鹤尾炉香斗无炉座,如云冈石窟第11窟南壁门拱东侧龕下铭刻石左侧首位引导僧所执手炉(图一一:2)<sup>[40]</sup>,此类手炉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吠哒时期犍陀罗手炉一脉相承。

1948年,河北景县封魔奴墓出土了一件鹤尾炉,折沿,不见炉座(图一一:3)。据墓志记载,封魔奴于“太和七年(483年)冬十一月九日薨于代京(今山西大同)……八年(484年)春二月宅窆于代京平城县之桑干水南……正光二年(521年)冬十月乙丑朔廿日甲申改葬于本邑

(今河北景县)”<sup>[41]</sup>。加岛胜认为,这件鹤尾炉是正光二年改葬时置于墓中的<sup>[42]</sup>,不一定正确。我们注意到,封魔奴墓鹤尾炉不见北魏洛阳时代鹤尾炉常见的连接炉柄与炉身的U形支架。从形制来看,这件手炉与云冈石窟所见无U形支架斜壁鹤尾炉(图一一:2)相同,实乃黄河流域最古老的鹤尾炉,当为太和八年封魔奴在平城初葬时的随葬器物。

太和十七年(493年),北魏迁都洛阳。孝文帝力主义学,广开法会,开启了北魏洛阳时代<sup>[43]</sup>。洛阳龙门博物馆藏北魏清河王元怱布施的一件鹤尾炉,为我们研究北魏洛阳时代鹤尾炉提供了实物标本(图八:左、一一:4)。2016年7月,我们对这件鹤尾炉进行了实地考察和金属成分检测。此件器物与封魔奴墓鹤尾炉非常相似,仅多了一个炉座,通长28.5、香斗及炉座通高7.2、炉座直径5.4厘米。香斗敞口,卷沿,口部残损,腹向下微收,炉座为单层莲花片状,手柄与香斗由U形支架连接。手柄正反面皆铸有铭文“清河王布施”(图八:右),说明这件手炉乃清河王元怱(487~520年)布施之物<sup>[44]</sup>。元怱乃北魏孝文帝第七子,宣武帝之异母弟,故此炉当为北魏皇亲国戚尊崇佛教的实证之一。

这次考察,我们还在这件鹤尾炉的手柄、香斗、炉座等处取样,共检测到7个有效数据<sup>[45]</sup>。检测结果表明,此件手炉各部分均为青铜[Cu-Sn-Pb(Fe)],系铜锡铅合金,含少量铁元素,而检测到的零星砷元素,从谱图看,应为铅元素干扰所致(表一)。有报道说,这件鹤尾炉为“铜质鎏金”,但我们检测所获的7个有效数据皆无鎏金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自北魏洛阳时代开始出现



了一种新型鹤尾炉,香斗为折沿式,有U形支架连接炉柄与炉身,如巩义石窟第1窟南壁东西两侧及第4窟南壁北魏帝后礼佛造像所见鹤尾炉。其中,第1窟南壁西侧上层右侧礼佛图中供养人所执手炉可清晰辨识出莲花底座,第4窟南壁礼佛图中比丘所持手炉可见三叉鹤尾形象(图一一:5)<sup>[46]</sup>。巩义石窟初凿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500~503年),这个鹤尾炉为我们探讨北魏迁洛后鹤尾炉演变提供了实例。

目前中国境内尚未见到北魏洛阳时代的折沿鹤尾炉,不过,日本收藏的两件折沿鹤尾炉属于这个时期。其中一件藏于正仓院南仓(编号52号-2),香斗纤长,折沿,下为莲花片炉座,手柄前端泡钉较大,下有饰片,有U形支架连接手柄和香斗,手柄末端鹤尾分三叉作羽毛状。这件鹤尾炉香斗内有一套斗,套斗上有小环,便于倾倒套斗中的香炷,而双层香斗亦可空腔隔热(图一一:6)<sup>[47]</sup>。另一件日本藏北魏洛阳时代的鹤尾炉,属于法隆寺献纳宝物(编号N280号),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馆(图九:2)。这件鹤尾炉材质为真鍮,采用锻造镀金工艺,手柄有朱书“慧慈”二字。慧慈为高丽僧人,推古天皇二年(隋开皇十四年,594年)东渡日本,深受圣德太子的敬仰和优待。据《日本书纪》卷二二记载,圣德太子“习内教于高丽僧惠(慧)慈……高丽僧惠(慧)慈归化,则皇太子师之”<sup>[48]</sup>。这件鹤尾炉底座写有“□方”针书铭。加岛胜认为缺字或为“带”字,与韩国庆州皇南大塚出土“夫人带”铭银腰带上的“带”

字写法相似,而刻铭内镀金,说明此铭是制作时刻写,“带方”或为法隆寺献纳宝物N280号鹤尾炉的产地。因此,他认为这件鹤尾炉为6世纪在朝鲜半岛制作,并由高丽僧慧慈携入日本<sup>[49]</sup>。

真鍮或称“鍮石”,也即黄铜。古代东西方冶金术不尽相同,中国以青铜(铜锡合金)铸造工艺为主,而波斯和中亚则以黄铜(铜锌合金)锻造工艺为主。丝绸之路开通后,波斯、印度鍮石相继输入中国,并成为汉唐时期炼丹大师点石成金的重要方剂。吐鲁番出土文书提到北魏年间高昌国从波斯进口鍮石<sup>[50]</sup>。199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尉犁县营盘墓地M20发掘出一件汉晋时期的黄铜手镯,说明西方鍮石(黄铜)已随东西方文化交流传入西域,并逐渐成为丝绸之路贸易中的重要商品<sup>[51]</sup>。1992年以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和静县莫呼查汗墓地发掘了一批青铜时代至汉代古墓,并在莫呼查汗号墓地北部汉墓发现锻造铜带扣,上有铆钉,必为锻造铜器无疑<sup>[52]</sup>。2016年11月,应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我们赴乌鲁木齐参加莫呼查汗墓地出土金属器保护项目结项汇报会,并在会上获悉莫呼查汗汉代墓地所出铜器中检测出黄铜制品。这个考古新发现相当重要,是中国境内目前所知最早的黄铜制品。

关于北魏洛阳宫廷陈设,《南齐书·魏虏传》记载:“正殿施流苏帐,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碗,盛杂食器。设客长盘一尺,御饌圆盘广一

表一 龙门博物馆藏清河王元怱鹤尾炉合金成分表

测点号	测点位置	检测时长/s	合金成分/wt%					
			铜/Cu	锡/Sn	铅/Pb	铁/Fe	砷/As	其他
lylm 25	手柄	31	71.32	17.77	7.06	1.40	1.79	0.66
lylm 26	手柄	31	73.50	15.92	6.96	1.43	1.56	0.64
lylm 31	手柄	31	71.47	17.29	7.47	1.23	1.52	1.02
lylm 27	香斗	31	54.18	25.93	15.39	0.95	1.97	1.58
lylm 28	香斗	31	57.52	24.17	14.62	0.54	1.90	1.25
lylm 29	炉座	31	82.48	12.94	3.48	0.72	—	0.39
lylm 30	炉座	31	83.47	12.58	2.68	0.97	—	0.30

丈。”<sup>[53]</sup>如果法隆寺藏鹊尾炉确为黄铜锻造,那么它很可能是北魏洛阳时代西域工匠在洛阳打造的。这件黄铜手炉采用鎏金工艺,可谓“金香炉”。山西博物院藏北齐库狄回洛墓出土鎏金铜香宝子,口径5.6、通高10.8厘米(图九:1)<sup>[54]</sup>,当与北魏宫廷“金香炉”配套使用,为我们探讨北魏洛阳宫廷御用鹊尾炉提供了重要实例。

据文献记载,鹊尾炉流通范围不限于北朝统治下的黄河流域。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记载:“宋费崇先,吴兴人,少信佛法,精勤。泰始三年(467年),受菩萨戒,寄斋于谢慧远家,二十四日,昼夜不懈。每听经,常以鹊尾香炉置膝前,初斋三夕,见一人,容服不凡,径来举炉去。崇先视膝前,炉犹在,方悟神异。自惟衣裳新濯,了无不净,唯坐侧有唾壶,既撤去壶。即复见此人还炉于前,未至席,犹见二炉,既至即合为一,然则此神人所提者,盖炉影耳。”<sup>[55]</sup>

考古发现表明,江南地区南朝佛教信徒也用鹊尾炉行香礼佛,如江苏丹阳南朝画像砖墓有羽人执手炉图像,应为模仿佛教的道教图像。香斗下炉座饰莲花,有U形支架与手柄相连,手柄末端为三叉鹊尾(图一二:1)。这件鹊尾炉的香斗为斜壁,无折沿,与北魏洛阳时代的无折沿鹊尾炉形制相似。考古发现还为南朝流行的鹊尾炉提供了实例,如湖北当阳长坂坡南朝墓出土鹊尾炉,莲花薄片炉座,香斗为斜壁,炉柄边缘为连弧纹,有U形支架,与北魏洛阳时代的鹊尾炉如出一辙(图一二:2)<sup>[56]</sup>。

## 五 结 语

综合全文的讨论,目前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焚香之俗起源于近东,最早的香炉实例见于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宝藏。这一习俗后为古波斯和帕提亚王公贵族传承。公元前1世纪左右,中亚犍陀罗高僧引入帕提亚手炉行香礼佛。犍陀罗早期手炉器形呈折沿三足盘式,手柄接在口沿处,如锡尔卡普出土帕提亚动物柄手炉以及绍托拉克出土犍陀罗浮雕所

见折沿式手炉。犍陀罗晚期手炉香斗呈半球式,无折沿,手柄亦接在口沿处,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犍陀罗龙首柄手炉。

第二,5世纪,犍陀罗手炉传入中国西北地区,最早的例证为甘肃炳灵寺石窟西秦壁画所见手炉,新疆克孜尔石窟6世纪末壁画中所绘手炉与之相同。香斗皆无折沿,手柄接在口沿处,长柄末端无鹊尾,器形源于犍陀罗手炉。阿旃陀石窟比丘造像所持印度手炉亦无折沿,但手柄接在香斗底部,与犍陀罗手炉不同。印度手炉在北魏平城时代传入黄河流域,见于云冈石窟第二期造像。

第三,黄河流域最早的鹊尾炉始见于云冈石窟,年代在北魏平城时代(471~494年);中国最古老的鹊尾炉实物出自河北景县封魔奴墓,当为太和八年(484年)封魔奴在平城初葬时的随葬器物。

第四,北魏洛阳时代(494~557年)开始出现莲花片炉座鹊尾炉,香斗为折沿式,有U形支架连接手柄与炉身,如巩义石窟北魏帝后礼佛造像。目前中国境内未见此类手炉实物,但日本收藏了两件北魏鹊尾炉,一件藏于正仓院南仓,另一件属于法隆寺献纳宝物。后者采用黄铜锻造工艺,通体鎏金,当系文献所言北魏宫廷的“金香炉”,很可能是西域工匠在洛阳打造的御用品。

第五,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南朝佛教信徒也用鹊尾炉行香礼佛,最早见于江苏丹阳南朝画像砖墓砖雕,而实物标本则为湖北当阳长坂坡南朝墓出土莲花座鹊尾炉,与北魏洛阳时代鹊尾炉如出一辙。

- [1] 参见(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二五之《香炉第八》,中华书局,2000年。
- [2] 王明珠《定西地区博物馆藏长柄铜香炉——兼谈敦煌壁画的长柄香炉》,《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
-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上),第188、228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 [4] 孙机《宣化辽金墓壁画拾零》,《寻常的精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 [5] 李力《从考古发现看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香炉》，《敦煌学国际讨论会论文集 1990：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 年。
- [6] 冉万里《略论隋唐时期的香炉》，《西部考古》（第 9 辑），科学出版社，2015 年。
- [7] 同[2]；李雪芹《云冈石窟雕刻中的长柄香炉小议》，《敦煌研究》2012 年第 6 期。
- [8] [日]加岛胜《柄香炉と水瓶》，《日本の美術》，No. 540，2011 年。
- [9] [韩]李溶振《韓國佛教香爐研究》，東國大學校大學院美術史學科博士學位論文，2011 年。
- [10] [韩]崔菊姬《中国古代长柄香炉》，《中原文物》2016 年第 5 期。
- [11] Elizabeth Rosen Stone, “A Buddhist Incense Burner from Gandhara”,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Vol.39, 2004, p.78, fig.15.
- [12] 本文所引吕底亚宝藏的落地式银香炉为安卡拉的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Museum of Anatolian Civilizations)藏品。吕底亚宝藏的狮子柄铜香炉照片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黄可佳在乌沙克博物馆拍摄并提供，谨致谢忱。
- [13] Jessica Rawson, “The Chinese Hill Censer, *Boshan Lu: A Note on Origins, Influences and Meanings*”, *Arts Asiatiques*, Vol. 61, 2006, pp.79–80.
- [14] 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 3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 [15] 同[6]。
- [16] 同[10]。
- [17] [英]约翰·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第 2 卷），第 212、849、850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 [18] 关于犍陀罗古代王朝的年代问题，参见 Ehsan Yarsha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 The Seleucid, 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Vesta Sarkhosh Curtis and Sarah Stewart, *The Age of the Parthians: The Idea of Iran*, I.B. Tauris & Co Ltd., 2007.
- [19] Philipp von Zabern, *Gandhara: Das Buddhistische Erbe Pakistans, Legenden, Klöster und Paradiese*, Bonn:Kunst- und Ausstellungshall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08, p.340, Kat.Nr.258.
- [20] 同[6]，图三：2。
- [21] Roman M. Ghirshman, *Persian Art: The Parthian and Sasanian Dynasties 249 B.C.–A.D. 651*, Golden Press, 1962, p.100, fig.111.
- [22] 帕提亚豹柄手炉图片根据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网站所公布藏品照片绘制。
- [23] Emma C. Bunker, *Nomadic Art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The Eugene V. Thaw and Other Notable, New York Collec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91, fig.182.
- [24] Albert von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Dietrich Reimer, 1922, Tafel 12.
- [25] Jacques Meunié, *Shotorak: 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Tome X*, Editions d’Art et d’Histoire, 1942, pl. XXXIII – 107.
- [26] 这两件犍陀罗龙首柄手炉图片均根据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网站所公布藏品照片绘制。
- [27] 新疆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图版 116，文物出版社、（日）平凡社，1989 年。
- [28] [意]魏正中《区段与组合——龟兹石窟寺院遗址的考古学探索》，第 64、6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Albert von Le Coq und Ernst Waldschmidt,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Dietrich Reimer und Ernst Vohsen, 1933, pp.28–39.
- [29]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图版 36、38，文物出版社、（日）平凡社，1989 年。
- [30] 李裕群、衣丽都《山西高平石堂会石窟》，《文物》2009 年第 5 期。
- [31] 同[10]。
- [32] 阿旃陀石窟第 26 窟全景照片可参见高田修、田枝幹宏《アジャンタ：石窟寺院と壁画》，图版 171，平凡社，1971 年。但这幅照片上比丘造像浮雕细部不如本文所引梁鉴所摄的特写清楚。
- [33] 此件印度青铜手炉图片根据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网站所公布藏品照片绘制。
- [34] Albert von Le Coq,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Leipzig, 1928, pp.167–168; [德]勒科克著，齐树仁译、耿世民校《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第 146 页，图 24，中华书局，2007 年。
- [35] 冯慧《中日所见晋唐时期的长柄香炉》，《考古与文物》2016 年第 5 期。
- [36] 李雪芹《云冈石窟雕刻中的长柄香炉小议》，《敦煌研究》2012 年第 6 期。
- [37]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 [38] 《魏书·释老志》，第 3036 页，中华书局，1974 年。
- [39] 同[36]。
- [40] 同[36]。
- [41] 考古简报称作“鏃斗”，参见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 年第 3 期。
- [42] 同[8]。

- [4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51~3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 [44] 调查得到龙门博物馆管理人员王迪、王凌虹的帮助，谨致谢忱。
- [45] 本次检测采用北京聚光盈安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MiX 5-600型手持X射线荧光分析仪，仪器序列号为0A4211610002。
- [4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图版4,38,39,148，文物出版社、(日)平凡社，1989年。
- [47] 同[8]。
- [48]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第25,26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
- [49] 同[8]。
- [50] 林梅村《输石入华考》，《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 [5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6期。
- [5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莫呼查汗墓地》，第302,303,348,349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 [53] 《南齐书·魏虏传》，第986页，中华书局，1972年。
- [54] 考古简报称作“高足杯”，参见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北齐鎏金铜香宝子照片引自群马县立博物馆编《观音山古坟与东アジア世界》，第16页，图-7，日本上每印刷工业株式会社，1999年。
- [55]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一四，第789页，中华书局，1961年。
- [56] 宜昌地区考古队《当阳长坂坡一号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责任编辑:戴茜)

##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agpie-tail Censer: From Gandhara to the Yellow and Yangtze Rivers

Lin Meicun  
Hao Chunyang

The custom of burning incense originated in the Near East, and the earliest case of censer is found in the Lydian Hoard of the 6th century BC. This custom was succeeded later by the Persian and Parthian aristocrats. Around the 1st century BC, Parthian hand censer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Gandhara, Central Asia; this kind of censer was in three-legged pan shape, and the handle was attached to the rim. In the 5th century AD, Gandhara hand censer was introduced into northwestern China, which is shown in the murals of the Kizil Grottoes in Xinjiang and Binglingsi Grottoes in Gansu. The Indian hand censer of the early 6th century AD can be seen in the sculptures of the Ajanta Caves, the handle of which was attached to the bottom of the censer bod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Gandhara hand censer. This kind of hand censer was also introduced into Pingcheng, the capital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seen in the sculptures of the Yungang Grottoes in Shanxi. Soon after be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Gandhara hand censer began its Sinicization proces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which is the baseless magpie-tail censer of the Pingch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handle of which was riveted into the inner side of the censer bowl. In the Luoya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magpie-tail censer with lotus petal base and flat rim began to be seen. The magpie-tail censer not only diffused into Korean Peninsula and Japan, but also influenced the form of the magpie-tail censer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 文物

## 重庆丰都二仙堡墓群2015年发掘简报

二仙堡墓群位于重庆市丰都县原镇江镇杜家坝村。为推进三峡水库重庆消落区2015年度文物保护工作，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会同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对二仙堡主梁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带墓道的砖室券顶墓9座。墓中出土陶器、瓷器、金器、铁器及铜钱等。根据墓葬形制、瓷器及铜钱特征判断，墓葬年代为两晋、南朝时期。墓葬的构建均经过预先设计，纹饰墓砖多经过精心布局。墓砖上出现的凤鸟纹、动物脚印、堆放痕迹、烧制痕迹等，对于研究该时期重庆峡江地区宗教思想、畜牧业发展、窑业制度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 贵州遵义海龙囤“新王宫”遗址F9发掘简报

海龙囤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海龙囤村西北的龙岩山巅，始建于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毁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平播战火，是播州杨氏土司留存至今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新王宫”遗址居于囤顶中部偏西处，是一组具有衙署性质的明代建筑群。2012~2014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新王宫”遗址进行了发掘和勘探。其中，F9发现于2012年，通过勘探厘清了其整体格局，并对南梢间进行了清理，出土器物丰富，尤以青花瓷数量最多，可以大略反映海龙囤遗址出土青花瓷器的一般情况，为研究该遗址及播州杨氏土司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 鹊尾炉源流考——从犍陀罗到黄河、长江

焚香之俗起源于近东，世界上最早的香炉实例发现于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宝藏，这一习俗后为古波斯和帕提亚王公贵族传承。约公元前1世纪，中亚犍陀罗佛寺引入帕提亚手炉，三足盘式，手柄接在口沿处。5世纪，犍陀罗手炉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炳灵寺石窟壁画所绘手炉。阿旃陀石窟造像可见6世纪前期印度手炉，手柄接在炉底，与犍陀罗手炉不同，其亦沿丝绸之路传入北魏平城，见于山西云冈石窟造像。犍陀罗手炉传入不久，便开始了中国化进程，一个突出实例即北魏平城时代无底座鹊尾炉，手柄铆入香斗内壁。北魏洛阳时代始见莲花片底座鹊尾炉，香斗为折沿式。北魏鹊尾炉不仅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并且影响到隋唐时代鹊尾炉的样式。